

“土木之变”后明朝政治变局 与皇位世系转移

Changes in Ming Court Politics and Shift of Imperial Lineage
after the Tumu Incident

赵现海

Zhao Xianhai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5 Vol. 14

故宫学刊

二〇一五年 总第十四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土木之变”后明朝政治变局与皇位世系转移

Changes in Ming Court Politics and Shift of Imperial Lineage after the Tumu Incident

赵现海

Zhao Xianhai

内容提要:

“土木之变”后，原来受到王振集团压制的文官集团、宣德旧阉，协助郕王完成了清除王振余党的工作。而郕府旧僚仪铭、王竑在这一过程中，劝谏郕王顺应舆论，消灭王振余党，为获取皇权奠定基础。经历这一政治事件，明朝权力主体已发生了极大的转移与变化。孙太后虽然立英宗幼子为太子，尽量将皇位世系保持在英中一系，但经历清洗王振余党事件后，明朝政局已完全由郕王，及追随其的政治势力所控制，明朝皇位世系也由此最终发生了转移。

关键词:

“土木之变” 政治变局 皇位世系 郕王 孙太后

ABSTRACT:

After the Tumu Incident of 1449, civil bureaucrats and eunuchs who served the court under the Xuande reign (1426-1435), regaining power lost when the eunuch Wang Zhen dominated the government, assisted Zhu Qiyu, the regent Prince of Cheng with the purge of Wang's remaining followers. The widely-supported move, carried out following the counsel of advisers such as Yi Ming and Wang Hong (1413-1488),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ince's ascension to the throne. After the incident, a drastically-shifted power structure was established in the Ming (1368-1644) court. After the purge, in spite of Empress Dowager Sun's best efforts to retain the line of inheritance with the captured Emperor Yingzong (the Zhengtong and Tianshun Emperor, r. 1436-1449, 1457-1464) by naming his son as heir apparent, Prince of Cheng and his followers had already seized control of the government, thus the shift of the Ming imperial lineage.

KEYWORDS:

Tumu Incident, political changes, imperial lineage, Prince of Cheng, Empress Dowager Sun

“土木之变”中，英宗被俘，王振被杀，内阁、六部等主要官员大都死于阵中，明朝政局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在这一特殊背景下，各种政治势力在政治舆论的推动下、在政治利益的驱动下，展开了多样而复杂的互动，而明朝皇位世系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由英宗系之景帝系的转移，对明中期政局形成了巨大影响。本文即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

一 “土木之变”后明朝政局的变化与郕王监国

“土木之变”后，明朝统治能否继续维持下去，或者会成为第二个南宋，都不得而知，在官僚集团中也存在巨大争议。在这种危机局面之下，作为皇室中地位最高的孙太后决议固守北京。“皇太后禁中疑惧，问太监李永昌，对曰：‘是也。陵庙宫阙在此，仓廩府库百官万姓在此，南迁，大事去矣。且陛下不闻宋靖康乎？因述靖康事。皇太后悟，自是中外始有固志。’”¹由于最初尚不知英宗是死是活，明朝在“土木之变”发生后的最初两天内，并没有启动另立新君的政治方案。甲子日即“土木之变”后第三日，“也先奉上宣府城内”，²朝廷应在当日晚些获知英宗被俘的消息。信息来源应一方面是宣府奏报，另一方面是英宗亲笔书信可能送达。³于是第二天，孙太后遂命郕王暂总百官，代行处理国家军政事务。“乙丑，皇太后敕郕王祁钰：‘迩者，虏寇犯边，皇帝率六军亲征，已尝敕尔等朝百官。今尚未班师，国家庶务不可久旷。特命尔暂总百官，理其事。尔尚夙夜祗勤，以率中外，毋怠其政，毋忽其众。钦哉。’又敕文武群臣：‘凡合行大小事务，悉启王听令而行，毋致违怠。’”⁴之所以委命郕王，是因为他是英宗唯一的亲弟，在英宗北征时，便已经受命居守北京，处理日常政务。“癸巳，命郕王祁钰居守，驸马都尉焦敬辅之。”⁵

郕王为英宗同父异母之弟，小的时候关系很好，故而英宗一直不命郕王出藩。在自己亲征之时，也将政权暂时交由郕王。但此时孙太后并未有立郕王为帝的想法，仍对英宗回朝充满期待。孙太后在命郕王暂总百官二日后，便扶立年方三岁的朱见深为太子。“丁卯，司礼监太监金英传：‘奉皇太后圣旨，今立皇帝庶长子见深为皇太子，该衙门便整理合行事宜，择日具仪以闻。’”⁶此时英宗对于自己能迅速回朝，也抱有很大期望。太子立二日后，英宗被瓦剌挟至大同城下，对出迎的大同官员称：“朕为所误，复何言。尔奏报皇太后，朕在虏中亡恙也。也先欲送还，使来，厚赏之，迟之益深入矣。”⁷大同镇总兵官郭登也谋划着寻机抢回英宗。“至晚，离（大同）城西二十里驻蹕。有夜不收杨总旗来与臣说：‘今夜有五个夜不收来，密请爷爷石佛寺去，待他寻不见时，便乘间入城去。’臣备奏知，上曰：‘此危事，使不得。先在土木时不曾死，我命在天，若万一不虞，如何好？’遂不用其计。”⁸此后瓦剌便挟英宗出明朝边境，游弋于阴山南疆，英宗迅速回朝的希望随之破灭。

1 （清）谈迁：《国榷》卷二七《英宗正统十四年》，中华书局，1958年，第1779页。

2 《国榷》卷二七《英宗正统十四年》，第1779页。

3 （明）袁彬：《北征事迹》，载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87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

4 （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乙丑条，第3510页，“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

5 《国榷》卷二七《英宗正统十四年》，第1771页。

6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丁卯条，第3512页。

7 《国榷》卷二七《英宗正统十四年》，第1781页。

8 《北征事迹》，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版，第88页。

英宗也认识到了此点,从而一改让明军开城的做法,命令固守。“上亲说与城上官军:‘这厮每说谎,不肯送我。你每守祖宗的城池,操练军马,不可怠慢。’”¹即使如此,景泰元年瓦剌挟英宗至大同时,明军仍有趁机夺回英宗的计划。“丙戌,也先伯颜帖木儿奉上皇至大同城下,声言归蹕。总兵官定襄伯郭登等朝服于闕,顿首置座。上皇不下马。登伏壮士城上,约驾入,下悬闕。及门,虏觉,拥上皇去。”²

在这一新形势下,国政必须有人主持,才能稳定国难背景下的特殊政治局面。太子过于年幼,完全不具备理政可能。孙太后碍于后妃不得干政的祖制与张太皇太后的故事,也无法实行垂帘听政。所剩的唯一选择,便是命郕王主持政务。英宗出边之日,孙太后遂命郕王主持政权。“尚念臣民不可无主,兹于皇庶子三人之中选其贤而长者,曰见深,正位东宫。仍命郕王为辅,代总国政,抚安天下。”³

从这一诏书可以看出,孙太后在英宗出境之情况下,仍竭力将皇统世系保持于英宗一系,将太子定位为国主。之所以不以其称帝,在于英宗仍为皇帝。可见,在“土木之变”后之国难背景下,孙太后最终愿望仍是期待英宗回归。

郕王之外,孙太后又以吏、礼二部尚书参与辅政。“甲戌,进吏部尚书王直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胡濙太子太傅。”⁴明代公孤官一般为大臣加衔,并非政治实职,但此时由于皇太子为政治中心,故而公孤官实为拱卫太子之实职,处于辅政角色,地位逾越于官僚群体之上。吏、礼二部尚书之所以受到重视,在于吏部为六部之首,胡濙资历最老,分别代表制度序列与资望序列,塑造皇太子权力核心地位。

二 郕府官僚主导下的捶杀马顺事件

但政治局势发展已超出孙太后控制。正统时期文官集团在宦官为核心,锦衣卫等为辅助的内廷势力压制下,所产生的压抑、仇恨情绪,在“土木之变”国难背景下,从而爆发出清洗内廷势力的政治诉求与潮流。

郕王御午门之左,都察院左都御史陈谏率诸臣廷启王振罪。王曰:“待取旨。”百官趋进,伏地不起,曰:“王振罪不容诛,殿下不即正典刑族灭之,臣等今日皆死此廷中。”痛哭呼号,不辨人声。郕府长史仪铭膝行前,锦衣卫指挥同知马顺叱退之。户科给事中王竑起,直前搏顺曰:“是非奸人党。”即众争击之。或脱顺鞶,捶眼洒血于廷,立死。朝班大哗,卫士皆泣。王环视屡起,尚书于谦直上揽王衣曰:“止!止!振罪首,不籍无以泄众忿,且群臣心社稷耳。无他。”王曰:“可。”竟入,将阖门百官随之。太监金英传令且退,众欲猝英,英惧,即传令曰:“许籍王振家矣。尚何言?”百官曰:“犹有长随毛贵、王□亦振党,请付外。”王令出二人门隙中,又捶死之。顷之,众执振侄锦衣指挥山至,相戒勿捶,使伏法。王命缚山赴都市磔之。遣左都御史陈谏籍振家,族属无少长皆斩。振宅

1 《北征事迹》,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版,第89页。

2 《国榷》卷二九《代宗景泰元年》,第1859页。

3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己巳条,第3518页。

4 《国榷》卷二七《英宗正统十四年》,第1785页。

在京城内外数区，重堂邃阁，拟于辰居，器服绮丽，上方不逮。玉盘二十，俱径尺。珊瑚树高六七尺，金银以库六十有余。王谕群臣且散，谦徐徐后行，衣尽裂。吏部尚书王直执谦手叹曰：“朝廷正藉公耳！百王直何能为！”百官请籍马顺、毛贵、王□家，宥之，曳三尸，弃东安门外道上，军民争击之。卫士汲水涂廷众血，仪铭曰：“毋其影，可以鉴。”¹

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殿下驾御午门左门，言官大臣次第宣劾王振章。有旨：“朝廷当别有所处。”众心郁愤，叫号不已。长史仪公造膝前免冠有言，于是众皆免冠长号叩首。已而有旨，急籍王振等家。然叫号不辨人声，不能皆听闻，惟仪公长号膝行而前，去袍服才咫尺。忽王给事中竑众中起摔马顺至前，曰：“奸臣党在是！”于是驾起门掩，一哄间，足履之下，尸暴血流矣。²

正统己巳八月二十三日，郕王御午门左，言官及诸大臣共劾王振误国之罪。有令旨：“朝廷自有处置。”众心郁愤，叫号不已。长史仪某造膝前免冠密言，众皆免冠。郕王见众情怒，命籍没王振等家。³

马顺尸体又被暴于长安门前。“顺体肥，暴其尸于长安门外，恨者犹殴之不释。众欲没其产，为中官沮之。可为附权者之戒。”⁴文官集团在捶杀马顺事件后，进一步清洗了王振余党。“令籍没太监郭敬、内官陈珪、内使唐童、钦天监彭德清等家，以皆王振党也。”⁵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文官集团对王振及其势力的极度痛恨，激发了他们的政治义愤，才有这种当廷打死皇帝侍卫长官，超越一般常理、违背朝廷法度的激烈事件。但这一举动在当时既被皇族谅解，又被后世颂赞，可见在国难的特殊政治时期，政治正义所激发之舆论情感已超越制度限制，而成为左右政局之主导因素。“王竑突起击死马顺，痛快甚，堪为刘球吐气。愤由义激，即竑亦不自禁，而所为悒悒邪，壮威势者多矣。李梦阳诗：‘王竑犯阙虽愚憨，舍命临危亦丈夫。’诵犹魄动。”⁶进一步说，文官集团由于将国难归咎于内廷反对派，从而不仅掌握了政治舆论，而且清除了反对派势力，从而成为主导“土木之变”后政局之决定性政治势力。

文官集团打击王振系内廷势力，尚对明朝皇位更替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王振系内廷势力为英宗之人，伴随这一集团之覆灭，郕王成为了这一宫廷变化的受益者。虽然在此突发事件中郕王之惊惧表现，显示出局势已远出其预料之外，可见其最初未有清除英宗内廷势力、掌控政权之计划。其心理简单而率直，并未有此城府与心计。但客观结果既如此，景帝登极后，对于文官集团这一过激行动并未追究，且重用参与之人，便可知其后来亦知这一事件之政治意义。“唐误玄宗者杨国忠，国忠诛并及贵妃，众愤泄矣。我朝误英宗者王振，振死并戮马顺、王长随、毛贵等，事同。然出于诸臣擅杀之罪，不可训。景帝能慨然籍王振家，赦王竑等勿治，迹浑机圆。其视玄宗之徒倚悲伤，姑若不得已听之者，相去悬绝，最转移人心妙诀。”⁷

1 《国榷》卷二七《英宗正统十四年》，第1783～1784页。王□为王长随。见《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午条，第3524页。

2 （明）叶盛撰，魏中平点校：《水东日记》卷一《记杀马顺等事》，元明史料笔记丛刊，第4页，中华书局，1980年。

3 （明）许诒撰，毛佩琦、李让整理：《复斋日记》，载《中华野史·明朝卷一》，第167页，泰山出版社，2000年。

4 （明）李贤：《天顺日录》，载（明）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卷四八，第115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5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乙亥条，第3533页。

6 （明）黄景昉著，陈士楷、熊德基点校：《国史唯疑》卷三《景泰》，第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7 《国史唯疑》卷三《景泰》，第70页。

而不同史料都特别记载了当时担任郕王官僚的仪铭的特殊举动,以及同样可能担任过郕王官僚的王竑的作用,都可以作为在捶杀马顺事件中,郕府官僚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角色。仪铭出身翰林系统,这是文官集团中对宦官集团仇恨较深的一个政治群体。他对郕王密语,应该是规劝郕王趁机清洗王振余党,从而收揽人心,为即位做准备。他也因为这一关键性的举动,在景泰时期迅速升迁,成为景帝的心腹重臣。“方廷晖时,仪铭能免冠长号造膝陈,为于谦助,所裨益多。初杨文贞议举铭自侍讲出,讲读郕王府,虑铭致恨,乃以故人杨翥同举。后铭、翥以从龙恩,官并尚书。功名信有命,而其才果有过人者。”¹

值得注意的是,《万历野获编》载王竑亦为郕府旧人。

至天顺初元,马顺子升,奏父为给事中王竑捶死,降臣为百户,乞怜臣父死于非辜,仍袭父职。上曰:‘顺本世镇抚,今升为世副千户。’盖英宗犹怜顺以为冤。而王竑时已为都御史,以郕邸旧臣,降为浙江参政,又勒为民,子孙俱永不叙用矣。²

虽然其他史籍皆未有相关记载,但从王竑仕途经历来看,似不无可能。《弇山堂别集》载王竑为正统己未,即正统四年(1439)进士,《明史·王竑传》亦继承这一记载³。但王竑正式为官却在正统十一年(1446)。“辛酉,进士王竑为户科给事中。”⁴长达七年之久。在这一仕途空白期中,王竑所从事者应为“观政”。明初以来,为便于进士熟悉政务,从而在其正式为官之前,命其于王府、中央机构中观察政事。虽然期限一般较为短暂,但正统时期,与王竑一样,观政七年者,亦属普遍现象。比如与王竑同属二甲之章纶,甚至在王竑授官两月后,始正式为官⁵。在捶杀马顺事件中,王竑与仪铭一样,皆表现出十分积极而激烈之态度,揆诸情理,可能王竑亦同为郕府旧人。

景帝即位后,也重用王竑,在北京保卫战中,便倚任甚重,很快便升其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提督守备直接关系京师安危之居庸关⁶。若王竑果为郕府旧人,那么捶杀马顺事件便进一步彰显出郕王势力争取朝廷舆论,从而拥立郕王之政治涵义与色彩。

在推动朝廷清洗王振余党的过程中,宦官集团、锦衣卫中不属于王振一党的势力也参与了进来。英宗即位之初,当时地位最高、资历最长的,并非王振,而是金英诸人,他们在宣德朝地位已经很高,受到宣宗的重用。

金英者,宣宗朝司礼太监也,亲信用事。宣德七年赐英及范弘免死诏,辞极褒美。⁷

范弘,交趾人,初名安。永乐中,英国公张辅以交童之美秀者还,选为奄,弘及王瑾、阮安、

1 《国史唯疑》卷三《景泰》,第70页。

2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一《禁卫·马顺范广》,元明史料笔记丛刊,第533~534页,中华书局,1959年。

3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五〇《兵部尚书表》,第930页,中华书局,1985年。

4 《明英宗实录》卷一四〇,正统十一年夏四月辛酉条,第2780页。

5 《明英宗实录》卷一四二,正统十一年六月壬戌条,第2818页。

6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正统十四年冬十月庚申条,第3633页;卷一八八,景泰元年闰正月乙丑条,第3844页。

7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〇四《宦官一·金英传》,第7769页,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

阮浪等与焉。占对娴雅，成祖爱之，教令读书，涉经史，善笔札，侍仁宗东宫。宣德初，为更名，累迁司礼太监，偕英受免死诏，又偕英及御用太监王瑾同赐印记。正统时，英宗眷弘，尝目之曰蓬莱吉士。¹

瑾，初名陈芜。宣宗为皇太孙时，朝夕给事。及即位，赐姓名，从征汉王高煦还，参预四方兵事，赏赉累巨万，数赐银记曰“忠肝义胆”，曰“金貂贵客”，曰“忠诚自励”，曰“心迹双清”。又赐以两官人，官其养子王椿。其受眷者，英、弘莫逮也。²

阮安又巧思，奉成祖命营北京城池宫殿及百司府廨，目量意营，悉中規制，工部奉行而已。³

但因为以上这些宦官与英宗关系不如王振亲近，因此在正统时期并未得到重用。王振拥有权势后，为巩固自己在宫里的地位，对他们采取打击政策。正统八年，宦官反对派在宫廷之中攻讦王振。“内使张环、顾忠匿名写诽谤语，锦衣卫鞠之，得实，诏磔于市。仍令内官出观，乃知诽谤者讦振恶也。”⁴ 双方矛盾既已公开化，王振便借故罪金英诸人。“下清平伯吴英，太监吴亮、范弘、金英、阮让等锦衣狱，俱私牧南海子、夺民刍。”⁵ 与此同时，颁布“禁私艺南海子”⁶之令，实为打击宦官反对派之口实。“十月壬午朔，敕禁内官内使私结外廷，嘱托营求。”⁷ 正统十一年，“乙亥，诛内使吴忠及养子勇士钦，以钦唆讼也。”⁸ 不过王振并未采取彻底根除的方式，从而为正统末年金英一派复起埋下了隐患。“正统十四年夏旱，命英理刑部、都察院、狱囚，筑坛大理寺。英张黄盖中坐，尚书以下左右列坐。自是六年一审录，制皆如此。”⁹ 而兴安亦请求英宗弃宫廷游玩，赴外朝临政。

季聪（林聪）尝授经京邸，多门生学子，因多知内外事。一日谓予曰：“闻禁中近习划龙船，朝下即事射鱼，酣笑为乐，或日【日久】始休。奈何？予因有午朝之请。奏既入，内批即下，刻日受朝。颇闻此事盖太监兴安等极力赞襄。惜乎当时外间诸公所见不同，反不足以副其意耳。”语多不记。¹⁰

“土木之变”后，金英一派重新上台，传达皇太后诏书、侍奉郕王的，都是金英。而郕王在监国过程中，同样甚得金英、兴安之助。与李永昌一样，金英、兴安亦反对南迁。“正统己巳，车驾蒙尘，敌势甚炽，群情骚然。太监金英集廷臣议其事，众喁喁久之。翰林徐瑄元玉谓宜南迁，英甚不以为然。适兵部尚书于谦奏

1 《明史》卷三〇四《宦官一·范弘传》，第7771页。

2 《明史》卷三〇四《宦官一·王瑾传》，第7771页。

3 《明史》卷三〇四《宦官一·阮安传》，第7771页。

4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第448页，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

5 《国榷》卷二五《英宗正统八年》，第1654页。

6 《国榷》卷二五《英宗正统八年》，第1655页。

7 《国榷》卷二五《英宗正统八年》，第1655页。

8 《国榷》卷二六《英宗正统十一年》，第1710页。

9 《明史》卷三〇四《宦官一·金英传》，第7770页。

10 （明）叶盛撰，魏中平点校：《水东日记》卷一《奏请午朝》，元明史料笔记丛刊，第5页，中华书局，1980年。

欲斩倡南迁之议者，众心遂决。”¹“其秋，英宗北狩，中外大震。郕王使英、安等召廷臣问计。侍读徐理倡议南迁，安叱之，令扶理出，大言曰：‘敢言迁者斩！’遂入告太后，劝郕王任于谦治战守。或曰叱理者，英也。”²正是金英等宦官之进谏下，郕王坚定了固守北京之决心。

在清洗王振余党的行动中，金英、兴安等也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捶杀马顺之后，文官集团再次向宫内索要王振余党，金英等王振余党推出午门，由文官集团捶杀。这从上引文便可看出。可见，“土木之变”后，处于王振对立面宦官群体再次得势，也借这个机会彻底清除王振余党。

宦官集团之外，锦衣卫中对王振势力有所怨言的士兵，也参与了清除王振余党的行为。作为捶杀马顺事件的参与者，叶盛记载王长随、毛贵二人被锦衣卫所杀。“百官稍退，惟上直军卫官候左顺门，哗云：‘尚有王长随、毛长随在。’少顷，校尉捽两人送锦衣卫，甫出左掖，军卫官捶死之久矣。盖驾既行，使人于门内伺外人何为，而惟闻此言，以为出自百官，殊不知因大驾出后，门禁颇严，两长随日事鞭笞，最结怨于军卫，而杀两人者上直官，非百官也。”³《复斋日记》也作如此记载。“诸卫士因大言索王、汪二长随。内缚二人送锦衣卫狱，甫出门，卫士共捶杀之。盖二长随因皆严捶挞卫士及都人，众皆怨之故也。”⁴

三 国难背景下扶立长君与郕王即位

文官集团经捶杀马顺事件后，对其他内廷势力也形成了巨大威慑，从而有了趁机控制朝政、振兴士大夫政治之政治诉求。而孙太后所设立之太子主政体制，不仅有瓦剌挟英宗以屈明朝之政权风险，而且有重演正统时期宦官专权之文官之祸，存在巨大政治隐患。故而虽然当时有在草原之明人归报也先有送英宗南归之心，但文官集团已决定扶立郕王即位。“后朝里差都指挥岳谦等同太监喜宁赍送赏赐，于也先处见爷爷，奏说家里如今要立郕王做皇帝。我再三言说也先诚心要送皇帝回来，你且不要立。朝里不肯信，只要立郕王做皇帝。”⁵可见，明朝不仅能更好应对国难局势，文官集团也可因拥立之功而获政治权势。

丙子，文武百官合辞请于皇太后曰：“圣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国势危殆，人心汹涌。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奠宗社。”疏入，皇太后批答云：“卿等奏国家大计，合允所请。其命郕王即皇帝位。礼部具仪择日以闻。”群臣奉皇太后旨告郕王。王惊曰：“卿等何为有此议？我有什么才何德，敢当此请？”退让再三。群臣固请，王厉声曰：“皇太子在，卿等敢乱法邪？”群臣止，不敢言，已而复请曰：“皇太后有命，殿下岂可固违？”兵部尚书于谦扬言曰：“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愿陛下弘济艰难，以安宗社，以慰人心。”言益恳切，王始受命。⁶

1 《菽园杂记》卷一，第4页。

2 《明史》卷三〇四《宦官一·金英传》，第7770页。

3 《水东日记》卷一《记杀马顺等事》，第4～5页。

4 《复斋日记》，载《中华野史·明朝卷一》，第167页。

5 （明）杨铭：《正统临戎录》，载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96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版。

6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丙子条，第3533～3534页。

实录对郕王严辞退让之描写，除套用准皇帝一贯谦让模式外，还有成化史臣突出宪宗正统地位之缘故。

但由此过程亦可看出郕王实为官僚群体，尤其文官集团所扶立。时人彭宪记载郕王接受即位之经过，与实录所载有所不同，似乎文官集团最初劝郕王即位时，孙太后诏尚未下。若果真如此，更可见孙太后内心之彷徨与犹豫。“是日，文武百官具本伏文华门，请郕王即位。王再三辞让。尚书王直、于谦、陈循等咸以宗庙社稷大计为言，力请不退。会太后命亦下，乃许以九月初六日即位。”¹景泰时期文官势力上升，亦正根源于此。在捶杀马振、拥立景帝过程，于谦皆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²，故其在景泰时期得以专政，既与国难时期军务最重要有关，也与其和景帝私谊有关。

此处虽载孙太后允许景帝即位，但简择皇位继承人，本为太后本分，而孙太后却迟迟不立郕王，待官僚集团代表外朝联合上奏，始加扶立，可见其心固在英宗父子，而非旁支。值得注意的是，午门议政时，侍奉郕王者已为金英，可见“土木之变”后，处于王振对立面之宦官群体再次得势，其倾向郕王，而非英宗，固在情理之中。也就是说，孙太后实面临举朝上下拥立郕王之势，已不容其有其他选择。六日后，郕王正式即位，是为景帝。

我圣母皇太后务慰臣民之望，已立皇庶长子见深为皇太子，令眇躬辅代总国政。皇亲公侯伯及在廷文武群臣，军民耆老，四夷朝使，复以天位久虚，神器无主，人心遑遑，莫之底定，合辞上请，蚤定大计。皇太后以太子幼冲，未遽能理万机，移命眇躬，君临天下。会有自虏中还者，口宣大兄皇帝诏旨：“宗庙之礼，不可久旷。朕弟郕王，年长且贤，其令继统，以奉祭祀。”³

该即位诏书实为孙太后与景帝政治利益之糅合。

一方面，诏书明确宣布皇统本在英宗一系，应由太子继承，景帝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代任其位，但不得改变皇统世系，死后仍由太子继承帝位。

另一方面，诏书赋予了郕王即位之合法性，即孙太后与英宗共同授命，但前者为表面形式，后者则杜撰附会。英宗既被瓦剌挟至草原，实难与内地通讯。时人李贤便记明朝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一直无英宗消息。“然上皇在虏，音问不通者一载有余矣。有自虏营脱回者，方知无恙。”⁴况且瓦剌之挟制英宗，并非仅为财帛，更为政权。正统十四年十月，国子监生练纲便奏：“虏寇奸计，非特邀留圣驾，索取金帛而已。其实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⁵景帝登极之后，瓦剌在草原为英宗举行复位仪式。“也先曰：‘中国别立皇帝，终不使皇

1 (明)彭时：《彭文宪公笔记》，载(明)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卷七二，第158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2 “太后命郕王监国，是日台谏廷论‘土木之变’，罪归王振。王方摄朝，仓卒未有处分，锦衣卫指挥马顺素附振意，颇不平，众怒击顺，死于廷，且索振所亲信二内侍，将击之，彼此喧哗，班行杂乱，无复朝仪，文武诸大臣皆惊避，公竖立不动，王亦疑惧，屡起欲退，公直前扶掖劝止之，且请降旨，令群臣立班，勿擅动，命红盔将军用瓜击二内侍，期亟死，王从之。时在廷上下相顾未已，公恐事出不测，复进言曰：‘请再宣谕群臣，王振罪固当赤族，俟启太后行诛未晚。马顺罪恶应死，勿论。’众稍定退朝，时过午刻矣。公袍袖尽裂，徐步出左掖门，吏部尚书王直迎执公手，谓曰：‘今日事起仓卒，赖公以定，虽百王直将焉用之！’公辞谢不敢当。”(明)于冕：《先肃愍公行状》，载(明)于谦著，魏得良点校《于谦集》，第674～675页，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

3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正统十四年九月癸未条，第3555页。

4 《古穰杂录》，第19页。

5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正统十四年冬十月辛亥条，第3616页。

帝还也。我当立皇帝为皇帝，帝之大都以南。’则设宴进马拜庆。”¹“十月初三日，有也先聚会众头目，杀马筵席，复立爷爷做皇帝。庆贺了，进大白马一匹。初五日，领人马起营，送爷爷回京。”²可见也先实有挟制英宗，以之为号召与标榜，从而占领汉敌，扶植傀儡政权。其后来率军南下，攻打北京，便系此意之体现。在这一政治考虑下，也先自会对英宗严加防范，后者之无法通讯明朝，当可相见。上引时人彭时《彭文宪公笔记》，便未载郕王接受即位，有英宗口讯之依据。随侍英宗之袁彬所记《北征事迹》明确记载了景帝即位后六日，英宗始写信禅位。

九月十六日，季铎赉赏，并圣母皇太后寄来貂裘、胡帽、衣服等物，到营见上，说初六日郕王已即皇帝位，又说文武百官奉皇子三人中年长者一人为东宫。皇上令臣写书三封，一禅位于郕王，一问安于太后，一致意于东宫，绝也先辟地之心，动景皇天伦之念。上看之，甚喜，当时祝天。³

瓦剌这一计划颇类于契丹之扶立石晋、金朝之扶立楚齐，实为内亚民族在缺乏对汉地有效统治手段时的一种间接方式。只是由于明朝另立旁支新君，坚决抗战，使瓦剌诱降明朝，尤其北方诸镇之意图并未实现。由此亦可以看出孙太后虚位以待英宗之为私利而非国计，文官集团扶立景帝之高瞻远瞩。《国史唯疑》认为景帝立时，明朝尚不知英宗生死，虽然错误，但其参考典故，指出明朝立景帝而非太子，遂握有政治主动权，却属通达之论。

郕王立，尚未知上皇之在虏营也，意沦陷矣。立最合机宜，可使丑虏息心，且为将来求讲誓地。令当时只立太子，虏挟驾至，不出迎，得乎？不迎罪同拒父，迎即坠彼术中矣。即郕王不蚤正大位，仅监国，亦终格格。⁴

或疑晋元、宋高非立弟乎？曰：“是不同。元帝、高宗虽以亲王继统，在晋怀愍、宋徽钦国破君辱之后；我朝第惩舆被羁耳，全盛天下晏如也。故胡得以之挟晋，晋得以之挟宋，而也先无所藉以挟我朝，一再犯不应，随气索矣。”追维景泰初诸臣定策之功，真不可诬。⁵

两种皇位世系的内在隐患，在国难背景下一时被掩盖了，而伴随景帝帝位逐渐稳固，由储位人选引发的“易储”事件，引发了景泰朝巨大的政治风波。

1 《国榷》卷二八《英宗正统十四年》，第1788页。

2 《正统临戎录》，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版，第96页。

3 《北征事迹》，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版，第88页。

4 《国史唯疑》卷三《景泰》，第69页。

5 《国史唯疑》卷三《景泰》，第69页。

四 结论

“土木之变”后，备受王振压制的文官集团，与同样受到王振压制的原宣德旧阉，甚至部分对王振集团不满的锦衣卫士兵，掀起了声讨王振集团的政治舆论，一起协助郕王完成了清除王振余党的工作。经历这一政治事件，明朝权力主体已发生了极大的转移与变化，文官集团更是借助政治舆论，在朝政事务中占据了有利地位。孙太后虽然立英宗幼子为太子，尽量将皇位世系保持在英宗一系，但由于太子过于年幼，无法掌控国难时期特殊政治局面。而孙太后碍于后宫不得干政的祖训，也无法走向政治前台。郕府旧僚仪铭、王竑积极劝谏郕王顺应政治舆论，消灭王振余党，为获取帝位奠定了政治基础。文官集团、宦官集团都依托郕王，完成了对王振势力的清算，自然也站在郕王一边。于是，经历清洗王振余党事件后，明朝政局已完全由郕王，及追随其的政治势力所控制，皇太后虽然仍有将皇位世系保持在英宗一系的想法，但在举朝上下拥立郕王的声浪中，不得不改命郕王即位。明朝皇位世系也由此最终发生了转移，对明中期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

